

## 識讀《客座新聞》

### 摘要

明代沈周（1427-1509）的《客座新聞》，書名新穎，頗具現代風格，實為古代中國罕見。就傳統定義，「新聞」為新異之聞見，這也是沈周撰寫的《客座新聞》的目的。沈周受盛名之累，門庭若市，筵宴四方人士，令其敘述見聞，並予以記錄，得名《客座新聞》。其搜羅、紀述的「新聞」事件，主要包含兩類，一是流傳街頭巷尾的奇聞軼事，二是轟動國家社稷的各類人物。換言之，《客座新聞》是報導當時口耳相傳受大眾矚目的重大人物、事件，加以集結成冊的書籍，也頗符合今日對「新聞」的定義。

本文先介紹沈周的家世背景，繼而蒐羅《客座新聞》的傳抄本、刻印本等各類版，並比較異同處；接著探究《客座新聞》搜羅新聞事件內容，並加以分類，同時以其他史籍考證「所見、所聞、所傳聞」是否符合史實，或與其他訛說之別；第三，分析書中蘊含沈周思想的旨趣；最後思索《客座新聞》對當代文士、南京地區以及明中葉後筆記小說發展等影響。藉由識讀《客座新聞》，或能得知名人獲取「新聞」來源、汲取新知之因、朝廷對於媒體的控制狀況，以及南京書籍刊刻事業發達的緣由。

關鍵詞：沈周、客座新聞、新聞、識讀、明代

## 一、「石田三絕」詩書畫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自號石田，晚年更號白石翁，<sup>1</sup>蘇州府長洲縣人，世居長洲相城里。生於宣宗宣德二年(1427)，卒於武宗正德四年(1509)，享年八十有三。一生跨越明代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與正德等六朝。終生未仕，為明代隱逸的代表；事母至孝，亦為明代孝行的楷模。

沈氏家族，遠祖可追溯至元朝時期的高祖沈懋卿。早先居住浙江吳興，因曾祖良琛入贅於相城徐氏，而遷居蘇州長洲，自此沈家世居於此。祖父為沈澄字孟淵，以儒起家，婚配朱氏，享年八十八。育有二子貞吉(1400-1483)、恒吉(1409-1477)能詩，有乃父之風，均以詩世其家。洪武時沈澄以人材應薦，但至南京後引疾歸鄉，<sup>2</sup>返回居處「西莊」。沈澄為人好客，一時宇內名流均前往造訪，常治具宴請賓客，筵宴間多以詩、酒為樂，吳人常以顧瑛(1301-1369)相比擬。<sup>3</sup>沈澄樂善好施，時任司經局正字的金間(1370-1448)因事繫獄十年，衣、食等生活起居均仰賴沈澄照應。<sup>4</sup>沈氏家族歷經元末兵亂而家道中落，自沈琛、沈澄二代克復基業，家族為之一振。沈家不以豐厚貲產聞名鄉里，更特重詩書禮義的培養教育，成為蘇州人士典範。<sup>5</sup>沈澄的次子恒吉，即為沈周父親。

沈恒字恒吉，以字行，別號同齋，生於成祖永樂七年(1409)，卒於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享年六十九。<sup>6</sup>幼時與長兄貞吉同學於家塾，延請翰林檢討陳繼(1370-1434)為塾師。沈恒擅畫，亦善詩文，「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餚，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真有漠然浮雲之意。」<sup>7</sup>恒吉迎娶唯亭張氏為妻，生男三人、女四人，沈周為嫡長子。沈周超群絕倫，除自身天賦異秉、聰朗絕人的因素外，書香世家的環境，也是重要的養成教育之一，自小隨側父執輩經常耳濡目染，而家庭裡「下及童僕，悉諳文墨」，<sup>8</sup>而收潛移默化之效。在蒙童時期，沈恒就汲汲為沈周延攬塾師，其師承有二：一是陳繼之子孟賢，但沈周才華在其之上，孟賢遂離去；二

<sup>1</sup>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4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卷24〈吳中往哲像贊二〉，頁496。

<sup>2</sup> 此處記載較為隱晦，實際狀況為：「官見其舉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參見明·劉鳳，《續吳先賢贊》(《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第31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卷12〈沈澄〉，頁356。

<sup>3</sup> 明·王鏊，《(正德)姑蘇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書》第2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正德刻本嘉靖續修本影印)，卷55〈人物十七·薦舉〉，頁874。

<sup>4</sup>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據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卷18〈仗義〉，頁1828。

<sup>5</sup>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40，陳頌〈同齋沈君墓志銘〉，頁293。

<sup>6</sup>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40，陳頌〈同齋沈君墓志銘〉，頁294：「卒於成化丁酉正月三十日，距生於永樂己丑九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九。」

<sup>7</sup> 明·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0，〈隆池阡表〉，頁686。

<sup>8</sup>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5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卷上〈白石翁先生〉，頁751。

為陸潤玉，沈恒聽聞陸氏工詩，亦延攬為家塾。<sup>9</sup>沈周少年得志，表現出眾，十一歲時曾代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sup>10</sup>儘管如此，沈周遵循族規，無意於仕途。景帝景泰年間，蘇州知府汪濬（1404-？）欲以賢良舉薦，沈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卒辭不應，決心隱遁。日後雖有王恕（1416-1508）、彭禮（1443-？）等人禮賢下士，亟欲招募帳下，但沈周事親至孝，均以奉養老母的理由回決，而不願入仕，成為明代山人郊居市隱的代表。

沈周雖淡泊名利，但仍十分關切國事，如王恕任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經常求教沈周，每聞時政得失，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sup>11</sup>沈周成名既早，名聞南北二都，與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李應禎（1431-1493）等人交好。但早先蘇州知府並不識泰山，因新建官衙尚需畫工藻繪，有人蓄意陷害沈周，促成此軼聞傳誦一時：

郡守汪濬俗吏，也不識公。偶立儀門欲圖，有惡公者謂濬，曰：「畫師沈周，可令槃礴。」汪使吏召之，公挾一點染身為指示：「日衣緇布服冠者老巾，坐土牛下。」守出，則跪於傍，畢事乃去。未幾，守以計入都謁，相國李南陽（李東陽，1447-1516）致饋，李卻之曰：「我不以阿堵自潤，所需沈啟南畫耳，因問啟南安否？」守茫然，不知所對。已謁，文定少宰（吳寬）復問如李，守復茫然不知所對，曰：「如沈君，門下不知耶，真一歉事。」<sup>12</sup>

此事引發朝臣李東陽、吳寬不悅，特別是吳寬。吳寬與沈周同為蘇州長洲人士，想一探同鄉近況，但知府卻茫然以對，不禁動怒：「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sup>13</sup>最後知府僅能厚顏前往沈家，「折節為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作為收場。<sup>14</sup>但沈周不願承情，至郡闕投謁致謝，奴僕亦膝行蒲伏表達感恩。實際上，沈周可用謁見權貴免服徭役，但他卻甘願繪壁供役以還。從此事件，可以窺見沈周的氣度非凡、不伎不求的個性。

沈周與其父沈恒十分相像，不單是書畫上的藝術天分，亦承襲其父好客的性格。其住所「有竹庄」經常掃榻以待，<sup>15</sup>致使賓朋成市，「設几乞言，有敬老之

<sup>9</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6〈史十二〉，頁 138。

<sup>10</sup> 明·文徵明、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25〈沈先生行狀〉，頁 583。

<sup>11</sup>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卷 25〈沈先生行狀〉，頁 583-584。

<sup>12</sup>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7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借月山房彙鈔本影印），卷 3〈沈布衣〉，頁 50。本則史事有二商榷之處：一是李東陽，誤植為李南陽（李賢），其他史籍均載李東陽，今改之；另一為知府的身份，《花當閣叢談》確名「汪濬」，但《本朝分省人物考》卻記「曹太守」，無法考究孰對？僅能暫因徐本。

<sup>13</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 10〈史六〉，頁 86。

<sup>14</sup> 明·朱國禎、王根林校點，《湧幢小品》（《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17〈往役〉，頁 3501-3502。

<sup>15</sup> 明·陳仁錫，《類編箋釋國朝詩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3〈自題畫〉。又作有竹莊、有竹居。

郡縣；款門求見，有好賢之士。」<sup>16</sup>這樣冠蓋雲集的景象，在其居所十分常見，且多來者不拒。沈周曾於城郭外置一行窩，每至此居，鄰里均廣為宣傳，形成乞求書畫者「舟闕河干，履滿戶限」的盛況，即使販夫、牧童，均能滿意而歸。<sup>17</sup>沈周有求必應，實為豪邁不羈的天性使然。

茅一相贊同蘇軾（1037-1101）所云：「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如書與畫。」<sup>18</sup>書畫是江南士商孤芳自賞或誇耀身份的重要表徵，因而爭相探訪沈周，其主因為書畫馳名，「凡作畫必題一詩，尤善書，人稱三絕。」<sup>19</sup>沈周篤學好古，自小文學左丘明（前 502-前 422），詩學白居易（772-846）、蘇軾與陸游（1125-1210）等三人，書法黃庭堅（1045-1105）。而畫承襲沈氏血脈的天賦，獨樹一幟，「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意態橫生。」<sup>20</sup>因而其書畫被譽為「二絕」。沈周的畫作在明代就享譽盛名，如何良俊（1506-1573）為華亭人，十分推崇沈周畫作，認為其畫以「韻」勝宋人。<sup>21</sup>高濂（1573-1620）讚頌石田為「名家」，認為其繪畫其可元、可宋，與文徵明（1470-1559）、陳淳（1483-1544）、唐寅（1470-1524）等人畫作具稱「高品」。<sup>22</sup>郎瑛（1487-1566）則推崇沈周的畫山石，已自成一家，「自坡腳直上，脈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sup>23</sup>但這類技法並不適宜初學者，最終只會落得畫虎刻鵠，遭眾人訕笑而已。或可舉一事為例：沈周於憲宗成化二十年（1484）前去杭州，途中某僧以一首七言絕句索畫：「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sup>24</sup>沈周欣然接受，透過詩中意境完成畫作。僧人文學深有造詣，其詩詞躍然紙上，透過沈周詩畫二長，才能將其想像美感落實於畫軸中，沈周功力之高足見一斑。且史例繁多，難能勝數。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同為蘇州長洲人，善書法，曾於氏著《吳郡丹青志》質言，沈周為當代第一畫士：

先生繪事為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冷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于屋中，山川集于几上，下視衆作，真崢嶸耳。山輿入郭，多主慶雲

<sup>16</sup> 明·吳寬，《家藏集》，卷 47〈沈啓南象贊〉，頁 434。

<sup>17</sup> 明·何喬遠，《名山藏》（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卷 96〈高道記·沈周〉，頁 446。

<sup>18</sup> 明·茅一相，《繪妙》（據明天啓程好之校刊本影印），〈繪妙引〉，頁 1。

<sup>19</sup> 明·高儒，《百川書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光緒至民國間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卷 20〈石田畫詩一卷〉，頁 302。

<sup>20</sup> 明·何喬遠，《名山藏》，卷 96〈高道記·沈周〉，頁 445。

<sup>21</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 29〈畫二〉，頁 263。

<sup>22</sup>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 6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版縮印），〈燕閑清賞牋中·論畫·畫家鑒賞真偽雜說〉，頁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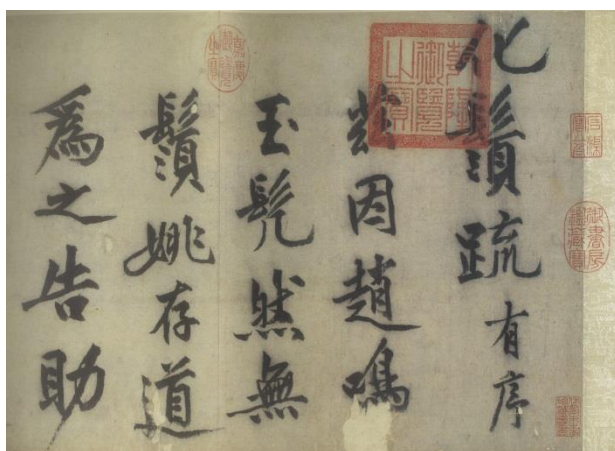
<sup>23</sup>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0〈沈王二畫〉，頁 296。

<sup>24</sup> 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影印），頁 1 上。

菴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勌。公卿大夫，下逮緇徒，賤隸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唐寅、文壁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于風雲之表。信乎，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sup>25</sup>

王穉登之言，雖可能為同鄉先進有溢美之嫌，但不啻為沈周畫作地位做一最佳註腳。

「書畫同體而未分」，<sup>26</sup>意味書、畫本為同源，關係密不可分。沈周喜於畫作題詩，使詩、書、畫三者相互輝映，成就一時。沈周筆硯多因丹青盛名掩蓋，但時人亦有求其書法者，如蘇州古董商金克和嘗求春聯，沈周為其揮毫：「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sup>27</sup>因店鋪與俞士悅（1387-1468）對門。俞士悅字仕朝，為長洲同鄉，累官至刑部尚書。士悅功在朝廷，曾在英宗正統十四年（1499）京師保衛戰時，協助兵部尚書于謙（1398-1457）擊退瓦剌也先（?-1454）的蒙古大軍。尋常古董商賈的生意，當然無法與朝廷命官拼搏，為求得商機，僅能借用沈周名號廣為宣傳，博取較佳的能見度。再者，沈周有幅〈化鬚疏〉字帖傳世，肇因友人趙鳴玉無鬚，姚存道遂請沈周作疏，向美髯周公周宗道勸說。<sup>28</sup>沈周以行書字體書寫，文詞義正辭嚴，卻又不失詼諧，令人忍俊不住。明人稱譽此帖：「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sup>29</sup>成為沈周書法流芳後世的代表作，亦是沈周能書善文的重要事例。



圖一 《化鬚疏》(局部)

紙本，原長 28.4 公分，橫 463.5 公分。此作筆法蒼勁有力，字體清秀挺拔，頗得黃庭堅神韻，為沈周行書代表作。

圖片來源：明·沈周，《沈周化鬚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

詩以言志，自太祖以降，歷代帝王多熱衷詩文。如仁宗朱高熾（1378-1425）在東宮就勤於作詩，並求教於楊士奇（1364-1444）。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

<sup>25</sup> 明·王穉登，《國朝吳郡丹青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7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王百穀全集本影印），〈神品志·沈周先生〉，頁 1-2。

<sup>26</sup>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18〈敘畫〉，頁 215。

<sup>27</sup>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石田為賣骨董門對〉，頁 41。

<sup>28</sup>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 5〈化鬚疏〉，頁 172：「茲因趙鳴玉髯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啟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闈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謔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於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sup>29</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 10〈史六〉，頁 211。

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sup>30</sup>楊士奇提點儲君，人君為國家所繫之重，不應沈溺於賦詩。楊士奇並不否定詩歌，他甚至於詩文大家，為「臺閣體」的領袖人物。<sup>31</sup>上行下效，文人莫不吟詩作對，詩文成為當時士人揚名立萬的憑藉，能展現自我才能、獲得同儕認可與社會階層尊崇，甚至因而取得一定的政經地位，<sup>32</sup>所以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石田詩詞亦絕佳，但為畫所掩，世不稱其詩。<sup>33</sup>據門人盛德霽輯錄，沈周詩歌僅七言絕句，就有二百七十餘首。<sup>34</sup>文徵明為石田門徒，認為其師雖宗於白居易、蘇軾與陸游三人，「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sup>35</sup>給予師尊的評價甚高。文徵明指出，石田詩高明之處，往往隨興所致，非刻意營造，「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sup>36</sup>特別是沈周的題畫詩，重視情景皆到，強調律調清新，目的在使人心曠神怡，眾人皆可傳詠。沈周作詩有一原則，遣詞用字必須合於情理。都穆（1459-1525）字玄敬，號南濠，為吳縣人，曾向石田學詩，有首〈節婦〉詩：「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提點其詩雖佳，「燈」字卻宜改作「春」，因《禮經》有云：「寡婦不夜哭。」都穆不禁歎服。劉仕義亦贊同此說：「若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sup>37</sup>

李日華（1565-1635）字君實，號竹懶，浙江嘉興人，工於書畫，精於鑒賞。曾在《六研齋二筆》云：「沈石田天賦異稟，苞茹奇奧。不獨繪事超奇，書法雄麗，吟情灑落，稱三絕而已，即遊戲之文，亦擅三昧。」<sup>38</sup>顯然認為沈周文章亦在水準之上。沈周目前流傳於後世的文集中，仍以詩歌佔多數，如《石田先生詩鈔》、《石田詩選》、《石田先生集》等，而《客座新聞》、《石田雜記》等則為雜著，另有《杜東原先生年譜》一書，至於《石田詠史補忘錄》、《續千金方》與《沈氏交友錄》等書恐亡軼多時，無法詳知內文。無論今時或明代，對沈周的認知仍停留在書畫名家，對其思想仍無所知悉，透過《客座新聞》或可窺探究竟。

## 二、追本溯源論《客座新聞》

《客座新聞》，又稱《客坐新聞》、《石田翁客座新聞》，是沈周的代表著作，為筆記小說。流傳迄今，其冊數、卷數均有所差異，而導致標題、內文均有所變

<sup>30</sup>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卷20〈朝端大政·御製〉，頁385。

<sup>31</sup> 可參閱連文萍，〈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22期，頁123-168。

<sup>32</sup>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2005，頁46。

<sup>33</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26〈詩三〉，頁236。

<sup>34</sup> 明·高儒，《百川書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影印），卷20〈別集〉，頁302。

<sup>35</sup>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卷25〈沈先生行狀〉，頁583。

<sup>36</sup>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26〈詩三〉，頁236。

<sup>37</sup> 明·劉仕義，《新知錄摘抄》（《叢書集成初編》第292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詩有別趣〉，頁6。

<sup>38</sup>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筆記小說大觀》39編2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4，頁309-310。

異。根據明、清兩代典籍記載，依照卷數多寡，約可分為下列幾種版本：

- 1、 三十二卷本：記錄在清代平步青（1832-1896）《霞外攬屑》。<sup>39</sup>
- 2、 二十二卷本：是最廣為人知的版本，計有五書：包括明代著名藏書家朱睦㮮（1518-1587）的《萬卷堂書目》、<sup>40</sup>焦竑（1540-1620）的《國史經籍志》<sup>41</sup>和張岱（1597-1689）《石匱書》；<sup>42</sup>以及清代黃虞稷（1629-1691）、<sup>43</sup>萬斯同（1638-1702）的《明史》均有此載。<sup>44</sup>
- 3、 十四卷本：輯錄於明代祁承燾（1563-1628）的《澹生堂藏書目》，分二冊，為賢說海摘本。<sup>45</sup>
- 4、 十一卷本：載記於清代丁輔之（1879-1949）編修《八千卷樓書目》，為南枚堂抄本。<sup>46</sup>
- 5、 十卷本：收錄在清代馮桂芬（1809-1874）修纂《（同治）蘇州府志》。<sup>47</sup>

傳抄至今，臺灣所藏的版本有限，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最多，計有三善本書，均為一冊不分卷：一是「明刊名賢說海本」較為人熟知，輯錄於《筆記小說大觀》裡；<sup>48</sup>二為《皇明百家小說》的明末刊本，三則清順治四年（1647）兩浙督學李際期（1607-1655）刊本，為《說郛續卷》本。其他流傳的版本中，《續修四庫全書》則為清初抄本，分十一卷，書名更為《石田翁客座新聞》，同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沈周集》（以下簡稱「上海版」）點校藍本。<sup>49</sup>至於《中國野史集成》收錄的《客座新聞》，為清順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刻本，同為《說郛續卷》本，但內容、卷數均無法與前二者相較。<sup>50</sup>至於浙江人民美術社出版《沈周集》

<sup>39</sup> 清·平步青，《霞外攬屑》（《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民國六年刻香雪庵叢書本影印），卷 6〈玉樹廬苜錄·明野史彙皇明名臣琬炎錄弇山堂識小錄〉，頁 504：「《客座新聞》沈周作，三十二卷，焦氏入小說。」

<sup>40</sup> 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七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清光緒二十九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影印），卷 3〈小說家〉，頁 518。

<sup>41</sup>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徐象標刻本影印），卷 4〈子類·小說家〉，頁 447。

<sup>42</sup> 明·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3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617。

<sup>43</sup>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6 冊，），卷 12〈小說類〉，頁。

<sup>44</sup> 清·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32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 135〈藝文志三·子部小說家〉，頁 402：「沈周，《客座新聞》二十二卷。」

<sup>45</sup>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九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清光緒十八年會蹟徐氏鑄學齋刻本影印），卷 7〈子部三·小說家〉，頁 283：「《客座新聞》二冊十四卷，又名賢說海摘本。」

<sup>46</sup> 清·丁仁，《八千卷樓書目》（《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卷 14〈子部·小說家類〉，頁 273：「《客座新聞》十一卷，沈周撰，南枚堂抄本。」

<sup>47</sup>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卷 137〈藝文志二·長洲縣〉，頁 501：「沈周，《詠史補忘錄》、《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續千字文》、《石田雜記》一卷、《客座新聞》十卷（焦志二十二卷）、《石田集》十卷（《四庫總目詩選》十卷）、《石田文鈔》、《沈氏交游錄》、《江南春詞》一卷（周等追祀元倪瓚之作）。」

<sup>48</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筆記小說大觀》第 40 編第 10 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

<sup>49</sup>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sup>50</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中國野史續編》第 26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清順治三年

(以下簡稱「杭州版」)有十二卷，則是參照《筆記小說大觀》、《續修四庫全書》二版本，構成現今最完整的一部《客座新聞》。<sup>51</sup>

《客座新聞》一書，題名新穎，頗具現代風格，但無序、跋，無從知悉沈周的撰述緣由，僅能試圖從明代史籍探蹟索隱。就書名推敲，可拆解為客座、新聞二部分：首先，客座亦作「客坐」，為賓客的坐處，可引伸為招待賓客的居室。顧起元（1565-1628）字太初，江寧人，晚沈周約一世紀，有部著名的筆記小說《客座贅語》，多記南京史事與逸聞。顧氏於序文中論及著書之因：

余頃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訪求桑梓間故事，則爭語往蹟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奇誕怪者以助驩笑，至可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余憇置於耳，不忍遽忘於心，時命侍者筆諸赫蹠，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帙，因命之曰《客座贅語》。<sup>52</sup>

顧起元自序裡，書寫年份為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顯見《客座贅語》為萬曆晚年作品。當時人在病榻，友人以舊事新聞相娛，遂成此書，「贅語」只是自謙詞。此書無論在名稱、內容，均與《客座新聞》相仿。沈周透過賓客「所見、所聞、所傳聞」的史事與傳說，遂成《客座新聞》。沈周可能為明代首位以此取材著書的人，而被歸類為小說家或雜家。

新聞，指新異的資訊和或消息。明代雕版印刷技術雖然發達，但傳播訊息仍多賴口耳相傳或手寫謄抄，且受限地域環境、教育水準等因素，無法有效傳播到各地，當時仍以兩京的傳播事業最為發達。新聞看似現代名詞，也絕非沈周獨創，早於唐代就有人開始使用這類名稱，當時多記一地瑣事，計有段成式（803-863）《錦里新聞》、<sup>53</sup>尉遲樞《南楚新聞》等二書，其中《南楚新聞》記錄唐末敬宗寶曆至哀帝天祐年間（825-907）的荆南事，但兩書均以亡佚。<sup>54</sup>宋朝有《道山新聞》一卷，作者、內容雖不詳，但在其他史書徵引下，僅留一條南唐時期李煜（937-978）的後宮韻事，卻成為瞭解女性纏足由來的最佳素材。<sup>55</sup>元朝則出現專錄佛事的《釋氏新聞》，此書亦不存，但可從耶律楚材（1190-1244）為其師萬松老人（行秀禪師，1166-1246）序文中粗窺梗概：「師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關涉於教化者，悉錄之，目之曰《釋氏新聞》。」<sup>56</sup>萬松老人著書目的，在於指點佛門子弟迷津，內容雖與前述三書不盡相同，卻是當時佛教禪宗傳播思想理念的重要媒介。相較於前面所列，明代沈周的《客座新聞》成為歷朝各代以來，以「新聞」名中較為完整的冊

---

宛委山堂刻本《說郛續卷》卷 13 影印），頁 312-316。

<sup>51</sup> 明·沈周、湯志波，《沈周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sup>52</sup>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 1。

<sup>53</sup>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06〈藝文志五〉，頁 5223。

<sup>54</sup> 宋·高似孫，《史略》（《四明叢書》第 1 集第 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卷 5〈雜史〉，頁 9 下。

<sup>55</sup> 明·徐樹丕，《識小錄》（《筆記小說大觀》第 40 編第 3 冊，臺北：新興書局，1990），卷 2〈纏足〉，頁 219-220。

<sup>56</sup> 元·耶律楚材著、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釋氏新聞序〉，頁 277。



書。

梁維樞（1587-1662）字慎可，號西韓生，直隸真定府人，曾在《玉劍尊聞》中論及《客座新聞》一書由來：「沈周晚歲名益盛，客益眾。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張筵四方人，各令述所聞，書於簡，曰《客座新聞》。」<sup>57</sup>推論此說，卻也似是而非。首先，沈氏為蘇州長洲望族，年少便飽受盛名之累，門庭若市的盛況，應已司空見慣，聲名、威望不因年紀而累加，而是始終維持於極盛狀態。且梁氏為明末人，《玉劍尊聞》之說，並未出現於友人王鏊、文徵明等論著中，因而此說有待驗證。儘管如此，但仍有一定史實依據。沈周博覽群書，好學深思，並不偏廢，「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sup>58</sup>來自四方人士講述來自稗官野史的各類新聞，可增添沈周對時事或怪譚的渴求，亦可達成「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淑世精神。

就地方風俗來看，吳人喜歡打探消息，「坐定，輒問新聞」，此說頗貼近《客座新聞》取名由來。李樂（1532-1618）字彥和，號臨川，浙江歸安人，為穆宗隆慶二年（1568）進士，對吳中流風頗不以為然，認為「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sup>59</sup>只有地方無新聞可說，才是真正的好風俗、好世界。儘管如此，透過《客座新聞》，可以瞭解明代江南人士所見時事、所聞訛言與所傳聞的異說，瞭解沈周的中心思想。

### 三、《客座新聞》內容介述

《客座新聞》該書最大特點，就是充滿文學之美。一如傳統的說部，以敘述明代正德前期的事例為主，內容談天說地，無所不包。雖說《客座新聞》著述的目的，本就不以記錄史事為取向，但從史學價值的角度，則關注於取材的史料是否得當、可信。沈周雖為隱逸，但仍掛懷當代政事，其造詣精深、涵養醇熟，無形中也促使他藉由聽聞客談，保存明代中、前期的新聞舊事。因而《客座新聞》的描述方式，不僅只來自賓客的道聽塗說，也加入沈周本身的見聞，內容十分廣泛，舉凡政治、經濟、制度、軍事、宗教、人物、鳥獸、草木與域外等均網羅無遺。

《客座新聞》現存十二卷，並無卷名，僅有條名，且並未分門別類，所涵蓋的事例眾多，無法一一列舉，僅能彙整數類，以概其餘。以李如一（1556-1630）對《戒庵老人漫筆》所言為例：「上搜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參訂往籍，糾核時事，凡可裨於日用兼有資於解頤者，多彙萃焉。」<sup>60</sup>綜觀《客座新聞》一書，其記載內容也不外乎如是，遂將內容粗分為國事、孝義、夢驗、奇譎與生活

<sup>57</sup>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4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麟堂刻本影印），卷3〈文學〉，頁12下。

<sup>58</sup>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卷25〈沈先生行狀〉，頁583。

<sup>59</sup> 明·李樂，《見聞雜記》（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7〈四〉，頁580-581。此說與陳繼儒在《安得長者言》的記載相同。

<sup>60</sup>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李如一序〉，頁1。

五類：

(一) 國事類

《客座新聞》體例不純，並不分類，也未繫年，但仍可從內容得知，描述的時間斷代是從太祖洪武元年至武宗正德三年（1368-1508），約一百四十年的各類消息，並上溯元代至正末年與群雄爭霸的狀況，亦有數條宋代史事點綴。國事中，以記載太祖朱元璋（1328-1398）的事蹟最多，多與任用術士、儒生有關。如卷一〈術士濟遇〉、〈開平王知過〉、〈太祖高皇帝埋宋諸帝遺骨〉、〈徐富九知幾〉、卷五〈術士胡日星禍驗〉，卷六〈太祖賜周伯琦詩〉、〈盛景華厚德〉、卷七〈姜子奇妻詩〉、卷十〈衍聖公知禮嚴尚書〉以及卷十一〈楊廉夫〉等十數則，這些事蹟的發生時間，多在開國前後。大體而言，在術士方面，多瀰漫讖緯之說，如〈術士際遇〉此條，主要強調術士識人之能，即使干犯十惡，仍因太祖「紫微星臨中宮，諸煞不忌。」<sup>61</sup>爾後該術士因此代為欽天監臺官。另則〈術士胡日星禍驗〉與「藍玉案」有關：

國初，星士胡日星者，太祖命遊四方，數年回，與其妻曰：「我命回京復命後當刑，汝宜料理。」其妻慰之：「數或有可逭者。」既入見，太祖溫諭遣回。適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日星推命，日星云：「公此去當封梁國公。但七日內，某與公同被難。」玉至京，果封梁國公。遂驕同列，尋驕衆訐其不軌，事當刑。玉嘆曰：「早記胡日星之言，安受封拜耶！」上聞，遂召日星至，問：「曾與玉言此乎？」曰：「曾言禍在七日之內。」上曰：「汝自推何如？」曰：「臣命絕在今日酉時。」日星亦受戮。<sup>62</sup>

胡日星不知生卒年，但確有其人，朱元璋有首〈題扇示胡日星〉足以佐證：「有一古老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予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四海遂行走。」<sup>63</sup>此條經王世貞（1526-1590）考證，與藍玉（？-1393）被誅的時間不符，<sup>64</sup>但仍足以證明太祖重用術士。

儒士則選擇且言行多為後人稱頌的人物，如〈太祖賜周伯琦詩〉中，描述元朝饒州鄱陽的周伯琦（1298-1369），以善於書篆聞名，於張士誠（1321-1367）勢力滅後，累徵不就的事蹟；<sup>65</sup>〈胡大川假偽〉則敘述松江胡大川精於吏筆，擅於興滅詞訟，在任三年即遁去，太祖不及終用的憾事。<sup>66</sup>朱元璋在位十分重視儒生、術士，早於至正二十四年（1364）即要求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書律者。」<sup>67</sup>在建國之初，也不斷徵集各地賢才為朝廷所用。

<sup>61</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1〈術士際遇〉，頁1132-1133。

<sup>62</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1〈術士胡日星禍驗〉，頁1215。

<sup>63</sup> 明·朱元璋，《明太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0〈題扇示胡日星〉，頁1下。

<sup>64</sup> 明·王世貞、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1〈史乘考誤二〉，頁383：「藍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妃事發，改封梁國公，又三年而誅。不惟國封不同，與征雲南絕無關係。今言封七日而誅，尤誤。」

<sup>65</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5〈太祖賜周伯琦詩〉，頁1228。

<sup>66</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6〈胡大川假偽〉，頁1231。

<sup>67</sup>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71〈選舉志三·薦舉〉，頁1711-1712。

周、胡二人均為江南人士，沈周實有借用這類事例，表達其嚮往隱逸的生活態度。

## （二）孝義類

章綸（1413-1483）認為，悃孝義一事最為剴切，古代帝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過乎孝悌而已。」<sup>68</sup>因而正史、方志多方蒐羅載記。而《客座新聞》記錄大量的孝行、義舉的事蹟，是本書的最大特色之一。孝行的條目，有卷二〈劉子賢孝行〉、〈王遊擊認父〉、卷四〈孫經兄弟孝感〉、卷八〈周孝婦〉、〈田氏三子孝行〉等多則，如〈劉子賢孝行〉是講述莆田劉瀾因家貧無法安葬父親，僅能以授徒籌措喪葬費用，遂於頸項鎖小鐵索，示「天地間一罪人」之意。<sup>69</sup>另則〈孫經兄弟孝感〉頗類《二十四孝》故事：

海寧青墩孫經，農家子也，父早歿。（與）弟緯奉母，以孝聞于鄉里。其母忽嬰一疾，醫莫能療。嘗時忽思食一物，得則無恙，少緩則疾作矣。由是二子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一俟其欲，而即奉焉。嘗欲大蝦為湯，二子正務農之日，即撤工，周行（河旁），不倦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驚惶無所措，遲疑于門。見水際忽動，兢脫衣入水撈摸，得數尾巨蝦且鮮，喜不自勝，將入治饌，以供其母。賴其孝養，存活數年。<sup>70</sup>

沈周聽聞後，不禁驚呼孫氏兄弟的孝行，竟暗合西晉王祥（184-268）「冰鯉幕雀」的故事，因而感動鬼神。沈周躬行孝悌，鄉里亦稱「沈孝廉」，足見對孝道的重視。

記錄貞婦烈女的義行篇目極多，包括卷三〈郭女貞烈〉、〈趙婦貞節〉、〈樂戶鄧氏守節〉、卷四〈趙千戶妻忠烈〉、卷五〈雲間張氏婦貞烈〉、卷七〈新喻周氏女貞烈〉、卷十〈吳女貞烈〉、卷十一〈杭州烈女〉等。這些貞婦、烈女，有人是為保全清白自縊，有人為國家盡忠飲鴆自盡，有人不願改嫁而自刎。多數事蹟僅記地點、人物，而無確切時間，其中〈雲間張某婦趙氏貞烈〉一事，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沈周得聞於松江知府劉琬所言，特別以三百六十餘字詳加載記：敘述華亭張榮之子放蕩形骸，後得心疾不起。原婚聘京衛指揮之女，張家僅能具書令其別議，但趙氏夫婦知女生性剛烈，雖有媒妁亦不敢許。後趙女決心前往侍拜公姑，善盡名分。當時趙女年僅十八，張氏夫婦嘗諭改嫁，趙女以自縊表達決心，自後終不敢言。劉琬聽聞，不僅上奏旌表其門，亦作詩傳頌四方。同郡顧清（1460-1528）字士廉，弘治六年（1493）進士，也傳其貞烈。<sup>71</sup>沈周推崇綱常倫理，重視持節侍孝，而以詩詞歌頌，如〈石節婦〉：「君不見松枯尚有節，蘭槁還留香。節婦之名不可泯，當與萬世扶綱常。」強調「孝婦雖已矣，令名身後光。」<sup>72</sup>

## （三）夢驗類

<sup>68</sup> 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6〈列傳六·侍郎章綸〉，頁1005。

<sup>69</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2〈劉子賢孝友〉，頁1156。

<sup>70</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4〈孫經兄弟孝感〉，頁1205。

<sup>71</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5〈雲間張某婦趙氏貞烈〉，頁1216-1217。

<sup>72</sup> 明·沈周，《石田先生詩鈔》（《沈周集》上海版），卷1〈石節婦〉，頁43；以及《石田稿補編》（《沈周集》杭州版），〈崔孝婦〉，頁621。

夢驗類與孝義類的篇目，實為構成《客座新聞》一書的兩大主題。《客座新聞》中，出現與夢有關的篇名，多數與科舉、仕途有關。除表示對功名的重視之外，也期望透過命定、天數，為自身挫敗或他人成就尋找出路。<sup>73</sup>這類主題較能迎合市井小民，成為他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包括卷一〈淮安學生夢驗〉、卷三〈朱希仁夢〉、卷四〈同年夢〉、卷六〈夢語得第〉、卷八〈朱狀元夢〉、〈都元敬夢〉以及卷九〈鄉闈夢驗〉等。這些事蹟因附有時間、人名，更貼近真實人生。如〈都元敬夢〉則是描寫沈周門生都穆為功名求神問卜的故事，都穆字玄敬，又作元敬，多稱南濠先生，與沈周同為相城里人，累舉不中，孝宗弘治八年(1495)鄉試，委托閩人代祈九仙，夢神仙云：「高莖莪，在何處。」都穆初不解，後得巡撫何鑑(1442-1521)推薦入試，經試者為高士達，一切才豁然開朗。<sup>74</sup>值得一提的是，位於福建莆田仙遊縣的九仙祠，就是以祈夢靈驗著稱，除都穆外，文林(1445-1499)亦曾差人前往九仙祈夢，<sup>75</sup>文林即為文徵明父。

另一類的夢驗，則是因果報應的應驗之說，如卷九〈負債償報〉、〈鬼報瘞德〉、卷十〈冤報〉、〈逆子果報〉、卷十一〈李牛郎發藏〉、〈色目人〉等。本來夢驗就強調命定，高中科考即是善報的象徵，而這一類的事例是以庶民為對象，「善惡有報」成為記述的主旨。如〈負債償報〉所記：

南陽鄧州張真一子庶，畢姻之夕卒。死後托清華北金林家為虎鬻狗，其防夜警次甚力。一夕，見夢於父真曰：「吾死後曾托林家為黑犬，因盜食豬肝被箠死。又踰年，復生金林家，緣欠其銀八錢，故償之。」明日其父會訪於金氏，其犬故猛惡，白日不通人來往，人有至者，家人必先繫縛之，然後接客。其日張至，犬繞其身，搖尾貼首，似故相識者。其家人以為異，張乃告犬托夢之故，欲贖回，金氏固不從。張去，狗趨送四五里，戀戀不忍舍。不踰月，犬亦死。<sup>76</sup>

明人深信地獄輪迴之說，否則「變做畜生償他冤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sup>77</sup>必須珍惜食材，不可鋪張浪費，否則將墮入畜生道，無法轉世為人。本事例中，張真因盜食豬肝與積欠銀兩，而轉世為犬。沈周深受佛道輪迴觀念影響，藉由這類故事，強調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就是期望勸善懲惡，以昭後世，是記錄事例的初衷。

#### (四) 軼事類

《客座新聞》蒐錄不少軼聞，多為朝廷官員，以江南人士為主要對象，其中有解縉、李賢等人反覆被提及，二人均為江西人。李賢(1409-1467)被記錄在

<sup>73</sup> 可參見夏金曉，《沈周〈客座新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頁26-27。

<sup>74</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8〈都元敬夢〉，頁1272。本則需勘誤，應為「閩」人而非門、問二字，因九仙祠在閩中，且徐禎卿《語林》中有相同記載，描述更為詳盡，亦對「莖莪」二字加以考究。可參閱明·徐禎卿，《語林》，〈九仙神〉，頁2。

<sup>75</sup> 明·陸粲、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庚巳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九仙夢驗〉，頁71-72。

<sup>76</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9〈負債償報〉，頁1307。

<sup>77</sup> 明·范景文《戰守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3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8〈戰部·戒妄殺〉，頁13下。

〈王文端公知人〉、〈王公度薦韓永熙〉、〈李文達公遇異人〉、〈李翁義救三商〉等則，前三則為李賢官場軼聞，後則則敘述其祖種植棉花，樂於助人，「種善因，得善果」而福蔭李家的經過。這類軼聞雖有人名、時間，但難免參雜讖緯、命定之說。從〈李文達公遇異人〉可見一斑：

成化初，閣老南陽李公賢，以少保、尚書、大學士為首相。幼時家居自牧，因縱牛于水次，見舟中坐一人，冠裳楚處，目公久之，乃曰：「小郎識之，他日位至三公，壽幾六十。」又曰：「幾作平聲字。」如是者數四。後公居相位，與雪峯潭覺友善。會酒間，告潭以此語，曰：「我位已極，今年五十九矣。明年符其言，將不利耳。」至是果薨。<sup>78</sup>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人，宣宗宣德八年（1433）進士。憲宗即位後，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成化二年（1467）冬卒，享年五十九，應驗此說。

解縉（1369-1415）字大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詩文字書，迥出一時，有李白風才。」<sup>79</sup>因而搜羅的軼事多跟詩文有關，如〈徐信友誼〉講述解縉作〈結交行〉讚譽崑山徐、張二人行誼；〈解學士不私〉則是以詩詞表示解縉有識人之明：「寄語龍潭曾子啟，明年好豎壯元坊。」曾子啟即是曾榮（1372-1432），號西墅，江西永豐人，永樂二年（1404）狀元及第。<sup>80</sup>〈解學士善應對〉則從介紹同為長洲人士的王汝玉（1349-1415），來凸顯解縉應對得宜。王汝玉本名璩，以字行，永樂年間名動一時，不幸於永樂十三年（1415）辭世，仁宗歎息：「王汝玉所作，我敬愛如神，惜乎不得文皇之心，為何如也？」解縉回答：「自古君臣為難得，蓋汝玉為無福耳。」<sup>81</sup>解縉應對，沈周讚譽得體、有方。然而，沈周對江西人頗有微辭，舉夏時正（1412-1499）為例，時正字季爵，少隨父居杭州仁和縣，憲宗成化五年（1469）任南京大理寺卿，隔年巡視江西，當時典吏常平以峻刑挫治鄉邑，地方豪民趁時正不察，謊稱常弟要求致仕，時正見其誠懇而應允，爾後才知受騙，但已無法收回成命。沈周言：「世稱江右人險詐，信不誣哉。」<sup>82</sup>

#### （五）日用類

日用類主要記錄生活諸事，可概分為醫藥、理化二類。在醫藥類中，提及中藥藥材療效與解毒方法，如〈治鳥傷〉中，倘若禽鳥斷翅、折足，可將芝麻嚼爛敷於傷口，即能痊癒。<sup>83</sup>〈戚宗陽治異疾〉則論及「石榴皮、棟樹東行根、檳榔

<sup>78</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6〈李文達公遇異人〉，頁1250。

<sup>79</sup>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24〈表字不同〉，頁358。

<sup>80</sup> 曾榮雖才學出眾，另有一說為解縉洩題才榮膺狀元，治為李賢所言。詳參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48〈天順日錄李賢〉，頁1156：「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榮。明日廷對，榮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列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淹不顯云。」

<sup>81</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6〈解學士善應對〉，頁1245-1246。

<sup>82</sup> 本則有兩處值得討論：一是此軼事分別記錄於卷六〈江右人多詐〉、卷十〈江西人險詐〉中，兩條記載內容雷同；二是名字錯置，《客座新聞》、《沈周集》記載為夏時圭，應為夏時正，今補正。詳見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6〈江右人多詐〉，頁1143；以及卷10〈江西人險詐〉，頁1329-1330。

<sup>83</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6〈治鳥傷〉，頁1145。

三味等分煎服」，造成腹瀉，便將寄生蟲排出，而被新安醫家汪瓘（1503-1565）寫錄於著作《名醫類案》裡，成為著名病例。<sup>84</sup>至於〈肉芝〉，則講述洪武二十八年（1395）有人掘地得肉芝，形狀「類嬰兒臂，紅潤如生」，卻因不識貨而丟棄的事例。肉芝最不易得，有詩云：「鳳凰玳瑁搗靈藥，二十四種黃金芝。就中肉芝最神異，仙人持作長生師。」<sup>85</sup>肉芝食用後能據稱增陽壽，而珍貴異常。〈毒物相制〉提到，若與河豚與鴨卵相食，則不被河豚毒害。<sup>86</sup>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亦記載解河豚毒法，其中一法就為「生啗鴨卵」。<sup>87</sup>顯見此為江南人士的常識。

在理化類的事例裡，以〈雞鳴枕〉最膾炙人口。雞鳴枕非以棉花填充、布帛縫紉，而是瓦製品，據傳為諸葛亮（181-234）發明。謝肇淛（1567-1624）於《滇略》考察典故，認為與諸葛亮征討孟獲入滇有關：「從征者冬暮思歸，各與一磚，曰：臥枕此，即抵家。從之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因號雞鳴枕。」<sup>88</sup>雞鳴枕特殊之處，在於內有機局以應夜氣，「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傳不差，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夜復然。」<sup>89</sup>崑山偶武孟不識精妙，以為鬼怪作祟而搗碎。徐應秋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看到此則記載，進一步提出西方自鳴鐘按十二時發聲，或與鷄鳴枕原理相同的質疑。<sup>90</sup>是否真為諸葛武侯發明不得而知，但顯見相類此物者明代應有，而被沈周加以記錄。另一則〈爐火之偽〉，沈周以第一人稱記載，包括點銀化金術與長生聚寶盆二事，可舉長生聚寶盆為例：

長生聚寶盆者，以灰築鉛池一箇，用鉛三四斤于池內，續入銀半兩，火上夾鎔。候面上黑光消盡，即止火，待其凝成一餅，以物于面上撥為一小窩，取餅出，置灰缸。每以水銀一兩或五錢注于窩中，覆以磁蓋，足中貯以水，四面溫火，養三四晝夜，火絕，水銀即死。再如之，成銀矣。取之鉛池中，所畜前銀皆耗散矣。此子母相盜，其氣自然而過，亦非真事也。又有水銀放綿紙上，就火炙之。水銀滋滋作聲，少頃，漸凝結，互傾地上，再取煎之，則是白銀矣，紙尚無恙。蓋丹客潛於銀箔，舖以銀一錢，其回殘末一錢，令挹入。水銀見火氣作聲，以為烟自走去也，止留回殘銀體，煎之豈非銀乎？<sup>91</sup>

沈周有感於貪婪之人常被這類把戲愚弄，迨老不悟，特以五百多字描述，破解其妙以警世人。相較於醫學類的平鋪直敘，沈周似乎對於物理、化學較有興趣，更以自己的角度加以描述，而從字裡行間中亦得知，曾深入瞭解金屬的化學現象。

<sup>84</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2〈戚宗陽治異疾〉，頁1167；明·汪瓘，《名醫類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卷7〈諸蟲〉，頁188。

<sup>85</sup>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7〈草語·芝〉，頁711。

<sup>86</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12〈毒物相制〉，頁1376。

<sup>87</sup>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珍物〉，頁13。

<sup>88</sup> 明·謝肇淛，《滇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0〈雜略〉，頁4下。

<sup>89</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1〈雞鳴枕〉，頁1136。

<sup>90</sup>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7〈雞鳴枕〉，頁4-6。

<sup>91</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3〈爐火之偽〉，頁1191。

值得玩味的是，明初著名富人沈萬三（1330-1379）亦為長洲縣人士，民間傳說其貲產來自聚寶盆，沈周也有記錄其事蹟，但主要針對沈萬三窮奢極欲的生活，強調尤物害人，為後世警戒。<sup>92</sup>

#### 四、《客座新聞》的價值

《客座新聞》作為筆記小說是相當出色的，一方面蒐羅的資料豐富，無所不包；另一方面沈周的筆法引人入勝，雅俗共賞，成為明中後葉流行的文本且傳抄者眾。然而，此書並未分門別類，雜駁不純，使閱者難能聚焦。更重要的是，《客座新聞》的成書，不僅來自沈周的大量修改、多次排版，更在講述者加油添醋、傳抄者畫蛇添足之下，雖使新聞更顯聳動，能吸引目光，卻也使得故事內容真偽難辨，也成為此書最為人所詬病之處。<sup>93</sup>《客座新聞》刊刻傳抄後，即有明人察覺訛誤甚多，其中以王世貞抨擊最烈，考訂也最翔實。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為蘇州太倉州人，為明代著名的文學、史學大家。弇州治史強調實證，史家必須澄清訛誤，還原歷史本貌，<sup>94</sup>而對於野史內容失真頗不以為然：

明野史彙，何彙乎？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諸野，其非君子之得已哉！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鄙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座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sup>95</sup>

王世貞認為，國史、家史與野史三者能互補不足，能窺見較完整歷史全貌，不可偏廢。其中野史有挾鄙、輕聽與好恠等三大弊端，意味著失去「求真」的精神。而《客座新聞》的闕漏，就是內容充滿鬼怪妖異之說，沈周末核實就加以記載。

王世貞甚至針對《客座新聞》內容進行考訂，計有十一條，可略舉二條為例：一是〈張布政一門死節〉，記錄張統曾於惠帝時任雲南布政使，後因靖難不願入仕投淵殉國。但王世貞考證此條有二誤：任官時間、自盡方式與史實不符。張統應於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建文四年（1402）謁見成祖後自經於後堂。王世貞言：「啟南所紀無一實者。」<sup>96</sup>查《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以通政使司試左通政張統為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sup>97</sup>鄧士龍，江西南昌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其《國朝典故》內亦記張統事蹟：「（洪武）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實錄。……壬午（建

<sup>92</sup> 關於沈萬三的記載，可以參閱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4〈安亭富民知幾〉，頁1203；以及卷6〈尤物害人〉，頁1238-1239。

<sup>93</sup> 湯志波，〈《客座新聞》成書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2期，頁116。

<sup>94</sup> 孫衛國，《王世貞史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151-152。

<sup>95</sup>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20〈史乘考誤一〉，頁361。

<sup>96</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2〈張布政一門死節〉，頁1166-1167；以及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21〈史乘考誤二〉，頁390。

<sup>97</sup> 《明太祖實錄》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己未條，頁3上。

文四年)六月,靖難之師入京城,討奸黨,統與焉。及上即位,召統與王純諭……統遂自經于部之後室。」<sup>98</sup>王世貞所言極是。

另一則為〈成國夫人料逆〉,未繫時間、不記名人。講述成國公戰死,其子隨征獨返,夫人要求其隨父殉國的經過。王世貞指出,此條謬誤更多:首先成國公為朱勇(1391-1449),其妻王氏,初封國夫人,後追封王夫人。次子信,授指揮使。弇州質疑:「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稱野史?」<sup>99</sup>朱勇嫡長為朱儀(1427-1496),並未如《客座新聞》所言立死。景泰元年(1450),朱儀以父歿奏請祭葬,景帝直言朱勇喪師辱國而不許,直至英宗復辟才追贈平陰王,諡武愍。<sup>100</sup>這也是王世貞認為此條毫無根據,連「野史」都稱不上的主因。

最遭人非議的,莫過於〈蠶神報冤〉此條。則是發生弘治十三年(1500),太倉孫廷慎聽聞浙江大戶因蠶多桑少,以土埋蠶降低開銷,到最後演變為殺人抵罪的報應故事。王世貞質言,這事原型應來自南宋洪邁(1123-1202)《夷堅志》中〈江陰民〉。〈江陰民〉故事頗類〈蠶神報冤〉,文末卻又言:「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sup>101</sup>續查《三水小牘》卻有其事,且發生時間為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sup>102</sup>由於故事脈絡太過相近,王世貞高度懷疑,此故事可能經過歷代眾多好事者加工而成,而沈周卻未盡查證之責。此事在江南地區流布甚廣,陳洪謨(1474-1555)的《治世餘聞》專記弘治朝見聞,亦抄錄沈周〈蠶神報冤〉此事,並言「此事江南人盛傳其事到京」,<sup>103</sup>顯見是江南人士無人不曉且喜見樂聞的傳言。日後,李詡以〈瘞蠶得禍相同〉為名,將兩條史料同載,請閱者自行評判。<sup>104</sup>徐應秋為萬曆時期人士,可能看過弇州考訂,除將《客座新聞》、《夷堅志》與《三水小牘》三事同列外,亦搜羅萬曆十六年(1555)流傳的同型故事〈袖中得生人掌〉詳加比較,認為應是當時賓客投主所好,復訛以襲訛變造的結果。

105

平心而論,王世貞的評論對沈周並不公允,畢竟沈周末入仕,也不以著史為己任,只是基於求新奇、求怪異的心理,加以記錄賓客耳聞目睹之事,而以能闡述綱常倫理、因果循環等思想為揀選標準,考證確切人物或時間並非必要。王世貞考察《客座新聞》的訛誤處,確實讓明代中前期的史事更有依據,更重要的,

<sup>98</sup> 明·鄧士龍,《國朝典故》,卷23〈革除遺事四·張統〉,頁389-390。

<sup>99</sup> 明·沈周,《客座新聞》(杭州版),卷11〈成國夫人料逆〉,頁1382;以及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23〈史乘考誤四〉,頁416。

<sup>100</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勳戚·朱勇卹典〉,頁810。

<sup>101</sup> 宋·《夷堅志》(《叢書集成初編》第270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十萬卷樓叢書本影印),《夷堅甲志》,卷5〈江陰民〉,頁38。

<sup>102</sup> 唐·皇甫枚,《三水小牘》(據清光緒十七年繆荃孫校補本影印),卷上,頁4-5。

<sup>103</sup>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篇卷4,頁63-64。

<sup>104</sup>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3〈瘞蠶得禍相同〉,頁122-123。

<sup>105</sup> 「袖中得生人掌」一事,徐應秋轉引自錢希言《猗園》而來。詳見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13〈袖中得生人掌〉,頁27-29:「萬曆十六年,吳江書生馮涵載米向蘇州山塘發糶。纔入城,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生人掌,鮮白帶血,暖氣猶蒸,怖恐不知所出。倉忙解纜,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掩取閉之,下艙啟視,乃一生人體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以此發悸病狂。」



弇州考訂必須四方搜羅資料，卻也保留不少未收錄於今日《客座新聞》的條目，其中有三條未見於《客座新聞》，有一條則收錄於《沈氏客譚》之中。弇州考史，實收考正、補闕之效。

世宗嘉靖以後，社會富足繁榮，生活安定舒適，使得士大夫熱衷於著書、刻書，尤鍾情於內容奇異的野史稗乘。使得傳統理學家的求學之道，不再只是重視經史的博雅，有人移情於科技、工藝等學說，有人開始記錄看似不經意的生活上枝微末節，他們均是博學多才的能士，不再被傳統文化所桎梏。<sup>106</sup>總的來說，沈周開啟兩股風氣之先：一是帶動「新聞」名稱流行，包含書名與用語二者。從書名上來看，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號少室山人，有《隆萬新聞》四卷；<sup>107</sup>范守己字介儒，四川開封府洧川人，萬曆二年（1574）登進士，仿南宋朱弁（1085-1144）《曲洧舊聞》，撰有《曲洧新聞》一書，共四卷兩冊；<sup>108</sup>至於魏裔介（1616-1686）的《資塵新聞》七卷，搜羅的故事類別雖似《客座新聞》，但來源截然不同，《客座新聞》的事件多抄錄於講者口述，《資塵新聞》則多鈔撮各類書冊、雜說而成。<sup>109</sup>不僅如此，「新聞」之名，約於神宗萬曆年後成為普遍用語，特別在「三言二拍」廣泛使用，書中常見「江湖上的新聞」、「新聞傳說」和「記錄新聞」等詞語，<sup>110</sup>使新聞與消息、信息等詞，在當時成為士民的日常用語。

二則促進筆記小說盛行，自弘治、正德年間後，吳中湧現大量筆記小說，難以勝數，其中與沈周交好人士多有著述，如都印《三餘贅筆》、馬愈《馬氏日抄》、陸容《菽園雜記》、朱存理《野航漫錄》、文林《瑯琊漫抄》、陳頌《閑古今中》、王鏊《震澤紀聞》與《震澤長語》、祝允明《野記》與《祝子志怪錄》、都穆《都公談纂》以及徐禎卿《翦勝野聞》等均屬之，文人間收藏、傳抄稗官野史，一時蔚為風尚。<sup>111</sup>正如陳繼儒所言：

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筭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為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sup>112</sup>

<sup>106</sup> 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頁 104。

<sup>107</sup>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4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8〈胡元瑞傳〉，頁 6。

<sup>108</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范守己有挾怨報復之嫌，「而於張居正屢以謀篡書之，未免恩怨之詞，不足徵信。」參閱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179〈集部三十二·別集類存目六〉，頁 3339-3940。

<sup>109</sup>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33〈子部四十三·雜家類存目十〉，頁 2755。

<sup>110</sup> 如明·凌濛初，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卷 12〈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頁 133：「阮太始道：『久疏貴地諸友，偶然得暇，特過江來拜望一番。』老者便教治酒相待。飲酒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新聞。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敝鄉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聞，這事卻是實的。』」

<sup>111</sup> 湯志波，《〈客座新聞〉成書考論》，頁 119-120。

<sup>112</sup>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又號白石山樵，松江華亭人，回顧蘇、松等江南士人交往情形，眾人以抄書為樂，藏書為快，而且儘量搜羅各方異談之書，實為生活之趣。沈周《客座新聞》在武宗正德年間問世後，迅速成為明代中後期取得新聞的中心、傳抄事件的藍本，包括陸釵（1439-1489）《賢識錄》、郎瑛《七修類稿》、胡侍（1492-1553）《真珠船》、李詡《戒庵老人漫筆》、焦竑（1540-1620）《玉堂叢語》、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王士禎（1634-1711）《池北偶談》均有援引，甚至《本草方藥參要》、《名醫類案》、《醫部全錄》等醫藥專書與《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植物用書亦有收錄，顯見為各方人士所重視。其中，沈德符撰寫《萬曆野獲編》時，表明曾受到沈周《客座新聞》影響：

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剽目睹，皆德符有生來所親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扉，淹該絕世，故《筆談》一書傳誦至今。吾家石田，雖高逸出存中上，終以布衣老死吳下，故所著《客座新聞》，時有牴牾。德符少生京國，長遊辟雍，較存中甚賤。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輦下者，或稍過石田，因妄為此筆。<sup>113</sup>

沈德符字景倩，原籍浙江嘉興人，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自幼隨祖、父生長於北京，直至祖、父去世才返回南方。沈德符自承得自兩位沈姓前輩沈括（1031-1095）、沈周感召，並與之相比擬。由於交往的人士均為京師名流，史料來源正確是稍勝《客座新聞》的原因，才敢妄加動筆。雖然《客座新聞》的缺點即是荒誕、訛誤過多，但並不影響它的評價，因而才有沈德符之輩，將其奉為圭臬，成為當時筆記小說的典範，形成一股流風。

## 五、結論

沈周以「詩書畫」三絕名聞天下，其撰述《客座新聞》新聞的目的，除好奇、求異的個性之外，也與賓客絡繹不絕有關，透過客談口說，沈周筆墨記載，同時加上沈周本身的見聞，遂成《客座新聞》一書。約可從三個方面加以歸納：

在名稱上，《客座新聞》即是表達來自眾人說法而成書。以新聞為名的書冊，雖前代已有，傳至明代多以亡佚，《客座新聞》殺青後，不僅帶動士人撰寫以新聞為名稱的書籍。更重要的是，在萬曆以後，新聞以成為士庶的尋常用語，與生活關係緊密。

在內容上，《客座新聞》兼容並蓄，雖未將所有內容將以歸類，但仍可大致分為國事、孝義、夢驗、軼事與日用五種，其中以孝義、夢驗兩類篇幅較多，也反映出沈周深受儒、道、佛三教思想浸染，期望藉由道聽塗說的生活瑣事，參雜綱常倫理、因果報應等說法，得到眾人共鳴，發揮濟世作用，振興善良風俗，強化社稷穩定。雖然飽受王世貞等人的批評，但石田著書目的，不在振衰起弊、經世致用或提供鑑戒等作為，只是單純記錄新聞事件，也讓當時士庶茶餘飯後的話題有所載記。

---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卷5〈藏說小萃序〉，頁63。

<sup>113</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續編小引〉，頁4。

在影響上，明代中期以後，江南地區的蘇州、松江文人集團喜歡藏書、抄書，內容不拘一格，愈荒唐無稽愈能引發閱讀、傳抄與收貯的興趣。《客座新聞》一出，促成明代中後期筆記小說、野史蓬勃發展，也豐富明代史學發展的獨特性，成為映照當時生活的重要依據。

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客座新聞》版本流傳迄今，從明代典籍所載的二十二卷，到今日所見的十一或十二卷版，已無法窺見其原書樣貌；也由於不詳加考證史實，有事直書，致使怪力亂神的篇幅過多，現今的影響力遠不如其他筆記小說。但沈周試圖保留這些街談巷語，實為今日研究明代中前期最佳素材。也讓世人見識，沈周身為書畫大家之外的不羈之才。



圖二 《客座新聞》書影

資料來源：明·沈周，《客座新聞》（《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10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卷1〈徐子虛為仙寄書〉，頁481。

## 引用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 元·耶律楚材，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高似孫，《史略》，《四明叢書》第1集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
- 明·文徵明、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5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4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
- 明·王世貞、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明·王穉登，《國朝吳郡丹青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71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王百穀全集本影印。
- 明·王鏊，《（正德）姑蘇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書》第2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正德刻本嘉靖續修本影印。
- 明·朱元璋，《明太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朱國禎，王根林校點，《湧幢小品》，《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七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清光緒二十九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影印。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何喬遠，《名山藏》，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
- 明·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筆記小說大觀》第39編第2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李樂，《見聞雜記》，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明·汪瓘，《名醫類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續修四庫全書》第11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明·沈周，《沈周化鬚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
- 明·沈周，《客座新聞》，《中國野史續編》第26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

- 據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本《說郛續卷》卷 13 影印。
- 明·沈周，《客座新聞》，《筆記小說大觀》第 40 編第 10 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
- 明·沈周，張修齡、韓星嬰點校，《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明·沈周，湯志波點校，《沈周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 9 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清光緒十八年會蹟徐氏鑄學齋刻本影印。
- 明·范景文《戰守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 3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茅一相，《繪妙》，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正德沈津輯刊本排印。
-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凌濛初，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
-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7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借月山房彙鈔本影印。
-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 明·徐樹丕，《識小錄》，《筆記小說大觀》第 40 編第 3 冊，臺北：新興書局，1990。
-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高儒，《百川書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光緒至民國間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
-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第 6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版縮印。
- 明·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據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 明·陳仁錫，《類編箋釋國朝詩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
-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陸粲，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庚巳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徐象樸刻本影印。
- 明·劉仕義，《新知錄摘抄》，《叢書集成初編》第 292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劉鳳，《續吳先賢贊》，《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第 31 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 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謝肇淛，《滇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1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影印。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丁仁，《八千卷樓書目》，《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
- 清·平步青，《霞外攬屑》，《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民國六年刻香雪庵叢書本影印。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鱗堂刻本影印。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
- 清·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2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二、 近人論著

- 王鴻泰 2005 〈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12): 1-54。
- 夏金曉 2016 《沈周《客座新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孫衛國 2006 《王世貞史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連文萍 2015 〈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高雄師大國文學報》22(2015.7): 121-166。
- 陳正宏 1993 《沈周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湯志波 2013 〈《客座新聞》成書考論〉，《明清小說研究》108(2013.2): 112-121。
- 廖瑞銘 2009 《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 To comprehend and read *Kezuo xinwen*

### Abstract

*Kezuo xinwen* by Shen Zhou (1427-1509) of Ming Dynasty is a true rarity from the earlier China, what with its refreshing and modern book title. By traditional definition, “News” denotes anything heard or seen that is novel or bizarre, which is also the purpose of Shen Zhou writing the book, *Kezuo xinwen* (meaning news from guests). Driven by burden of fame during his old age, Shen Zhou constantly held banquets to host guests from far and wide and requested them to narrate stories they had seen or heard, and such stories were thus recorded and named as *Kezuo xinwen*. The “News” events collected and narrated primarily encompass two categories: anecdotes circulated all over the streets and alleyways; all types of personalities that shocked the nation. In another word, *Kezuo xinwen* is a book compiled with reports on major characters or events that came to public attention by word of mouth, which incidentally also complie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News” today.

The pap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rst, to gather various hand-copied or printed editions of *Kezuo xinwen* and compare their likenesses and differences; second, to explore and categorize the content in *Kezuo xinwen* while cross-referencing “what was seen, heard or said” against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verify if it is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facts or in conflict with any other hearsays; third, to analyze Shen Zhou’s thoughts embedded as the motif in the book; last, to contemplate on the impact *Kezuo xinwen* has had on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intellectu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ketches in the Nanjing area after the mid-period of Ming Dynasty. With “To comprehend and read *Kezuo xinwen*”, such territories as the news sources in Ming Dynasty, the reasons behind acquiring the news, the state of control the imperial court had on the media, and the cause for the thriving book printing business in Nanjing may be fathomed out.

Keywords: Shen Zhou, *Kezuo xinwen*, literary sketches, Suzhou, Ming Dynasty